

13-15 世纪伦敦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考察

□张 思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世纪晚期的伦敦, 受到生活垃圾污染和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噪声、水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困扰。究其原因, 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导致人口过度激增、作为英国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等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为此, 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通过颁布法令条文、强制有污染的工业场址迁移出城、增设政府机构和职官等多种方式, 对城市环境污染予以整治。

关键词: 中世纪晚期; 伦敦; 城市环境; 治理

〔中图分类号〕 K5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4) 03-0122-04

环境史作为以新社会史为核心的西方新史学后起之秀, 在二战前后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和各国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环境立法的整体背景下, 愈发引起多学科研究者对它的兴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引导着具有人文关怀的史学工作者去探究历史中的环境。新城市史学者赫斯伯格也认为应将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 其动力模式是环境、行为、团体经历这三大因素在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1〕} 环境史和新城市史的共同之处, 奠定了城市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目前城市环境史不仅研究主题丰富, 含有空气、水土、动植物生态系统等自然环境, 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城市公共政策、人的自我意识等与各类城市环境问题的关系; 其研究方法也颇为多样, 有内在论和外论之分。

然而, 环境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局限于工业革命及其后的欧美, 对近代乃至更早的古代中世纪欧洲的环境问题, 给予的关注较少。诚然中世纪西欧社会也要面对数次垦荒后的土壤贫瘠、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噪声污染、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水体污染等。学者杰逊·摩尔就认为愈加深刻的社会生态矛盾撕裂了中世纪的欧洲, 封建社会因而耗尽了赖以获得收入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整个社会的人口处于一种易受疾病侵袭的状态。^{〔2〕} 环境问题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笔者试图就此文浅析位于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发展层级最顶端的首都伦敦, 在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黑死病多次肆虐的13-15世纪里, 如何应对种种环境问题、最终脱胎于中世纪晚期污秽的。不当之处, 请各位不吝指正。

—

伦敦于罗马不列颠时期建城, 经盎格鲁撒克逊初期近百余年战争的停滞与破坏后再次发展。至中世纪中晚期, 伦敦作为英格兰工商业和贸易中心、政治与宗教中心中的地位虽有起伏, 但在欧洲西北部岛国城市图表中毫无疑问仍

是最大、最重要的城市。而从城市环境卫生的角度审视之, 13-15世纪伦敦城的环境卫生甚是令人堪忧。美国中世纪史专家詹姆斯·威斯特福尔·汤普逊于其著作中指出: “在法国和英格兰, 没有任何商业城市能与波尔多相媲美。伦敦虽富但很肮脏; 波尔多则富饶而美丽。”^{〔3〕} 德国萨尔兰德大学近代史教授里夏德·范迪尔门在其书中宏观描绘着欧洲城市: 从形态上来看, 城市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塔楼和多层的大房屋建筑聚集在很狭窄的、遮挡住视线的、弯弯曲曲的巷子里。参差不齐地交错在一起房屋的特点是楼层多、建筑面积很小……许多手工业者利用街道作为劳动场所, 把废物和垃圾都扔到街上, 让猪任意在街道上乱跑, 这就使得街道更加拥挤不堪。不可言状的肮脏和臭味让人无法联想到“散步”。^{〔4〕} 如现当代的城市社会一样, 那时的伦敦人也被日常生活垃圾和工业生产带来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困扰着, 由那些从中世纪保留至今的街道名称中可略见一斑, 如内脏巷 (Gutter Lane)、烂泥巷 (Seething Lane)、腐烂巷 (Staining Lane)。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深入探究其原因:

首先, 罗马不列颠时期占地仅330英亩左右的伦敦城市规划较好, 道路两旁有排水通畅的污水沟, 城区内至少有3处公共浴室。而后历经战争的伦敦非但没有将这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承袭下来, 而且与其他以工商业者聚居地著称的中世纪城市一样, 城内有农业生产、家庭饲养牲畜。尤其后者非常不便于居民的日常生活, 街道上肆意游走的动物对人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1332年一头流浪的猪在一家店铺门口将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女婴致死; 再如一匹没有拴好缰绳的马将一名伦敦市民致死, 另一匹狂怒的马咬掉了约翰·德·拉德克里夫的耳朵; 1307年两只打架的狗将其中一名狗的主人致死, 因此, 后来人们若想在家庭中养狗, 必须先在城区民众大会上征得邻居的同意方可饲养。另外, 动物的粪便和人的排泄物处理不当, 也不利于城市内部的环境与卫生。中世纪和

〔收稿日期〕 2013-10-18

〔作者简介〕 张思 (1985-), 女, 黑龙江牡丹江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世界中世纪史。

早期欧洲最富有的宫殿和城堡，厕所也只不过是地板上面的一个洞，直接流到街道、护城河或干脆就流到建筑物的墙外。^[5]除贵族富商外，伦敦一般平民家庭是没有私人厕所和私人浴室设施的，公共厕所和浴室大约迟至14、15世纪才出现。

其次，13-15世纪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伦敦城内人口总量激增，加重了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城市公共设施。1300年伦敦的人口估计多达80000至100000之间，其后开始缓慢下降，数次黑死病时期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至1400年城市人口约为1300年的一半，直到15世纪末叶人口才再次持续增长。^[6]单凭人口的自然增长，中世纪晚期伦敦城市人口最高值难以达到十万，外来人口在伦敦社会各阶层所占比例较大。P. 拉克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移民分为改善型移民、生计型移民和外国移民，^[7]这三种类型在三个世纪的伦敦城市人口中均有体现。众所周知，意大利商人、汉萨同盟商人和弗兰德尔的技术织工，为中世纪晚期伦敦在英国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国内各地城乡男孩通过学徒制度进入伦敦、有从商经验的男子通过购买获得市民资格、有实力的郡级城市商人家族派遣一两成员到伦敦经商以便与伦敦建立商贸联系等都属于改善性移民，15世纪里这类人群不再主要来自伦敦城周边，而是延伸到英格兰西部和北部等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当然，如流传下来的有关曾任伦敦市长的迪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的小书册里所描写的，伦敦对于那些和儿时的惠廷顿一样贫苦无依的穷人和流浪汉而言，是一个遍地有黄金、到处是机遇的天堂般城市。因此，大量的社会下层人在这聚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下层流浪汉加重了社会无序和治安方面的危险，居民生活垃圾和工业生产废弃物急剧增加等。其间，伦敦市的贫富分化已表现在城区规划上，城市西区是官僚贵族、地方富贾、主教们的聚集区，城东、南、北及泰晤士河岸旁为下层人们和外来移民的聚居地，相对于前者华美宽敞的住宅，后者居住条件拥挤、空间狭小、人畜同居，环境卫生状况甚是糟糕。

再次，中世纪的伦敦确实是一个工商业兼备的城市，凭借位于英格兰东南部优越的地理位置、横跨数条国内主要陆河运交通要道、便于与西欧大陆各国密切联系的泰晤士河，伦敦成为国内商品交换和物资分配的中心，英国羊毛、呢布等五大宗出口货物和葡萄酒、香料等奢侈品进口的重要港口。但同时伦敦在中世纪还是一座以消费带动生产的工业城市，其工业有较强的专业性。颇具实力的十二大商业公会中除呢布商、绸缎商等纯属商人组织外，还有金匠和皮革匠构成的商业公会、成衣匠和衬衫业合并的服装商人公会、漂练工人和剪绒工人合并的呢绒工人公会，另外城市中也有如武器匠、刀具匠、铁匠、刺绣工人等一般的手工业者。工业生产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城市环境卫生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认为城市工业污染对中世纪伦敦街区环境整洁非常不利，例如建立在弗利特河旁边的制革厂和酿酒厂，使城市变得肮脏无比、臭气熏天。^[8]虽然此时工业的动力来源大多是畜力、风力、

人力，但工业废弃物的环境污染却不可小视。例如屠宰牲畜后剩下的污血和动物内脏，蹂革业、漂染业、酿酒业的工业废物倒入河流对水体的污染，冶铁炼铝业燃烧海煤产生烟尘形成的空气污染，锻造金属制品和武器造成的噪声污染等。凡此种种都深刻影响着居住在伦敦城的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邻里间也会因此而互有怨言、发生纠纷。14世纪伦敦居民理查德·拜尔和妻子艾玛在家内屠宰场修建了用于清洗动物尸体的水池(skaldyngghous)，结果混有污血和皮毛的废水顺着道路两旁的排水沟流入方济各修士会的花园，致使那里臭气熏天；伦敦西区的贵族富商们时常抱怨有屠户在霍尔本桥宰杀牲畜，因为污水顺势流进了弗利特河；即使不在夜间作业的铁匠也不受邻里的欢迎，爱丽丝抱怨锻造铁制品时产生的巨大力量震得墙壁晃动，熔炉里冒出的烟蔓延到所有的房间，甚至是贮藏各种酒的地下室；^[9]13世纪后二十五年，伦敦开始被海煤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所困扰，王室先后于1285年和1288年派出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可见问题之严重。当然，除工业燃烧海煤外，空气污染与英国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有关。英国地处西风带，气候温和湿润。每到秋冬季节，从海洋吹来的大量暖空气与岛屿上空较冷的气团相遇；北大西洋较暖的水流与不列颠群岛区域较冷的水流接触，形成浓厚的海雾，笼罩着英国上空，伦敦尤为严重。^[10]

二

判断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决策优劣和效能高低可分别从其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整治和对城市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两方面入手，^[11]这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加罗林·巴伦的观点。而中世纪后期，面对愈加恶劣的城市环境问题，国王、城市政府、乃至基督教会相继给予了关注，尤其在历经了以黑死病为主的疫病数次侵袭之后。尽管此时欧洲城市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仍是房屋拥挤、垃圾满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但这并非意味着市政当局对此没有任何作为，相反他们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监管和治理，如颁布相关的法令条例、增设专门负责城市卫生的机构和职员。

针对居民在家中饲养牲畜而产生的污染和安全隐患，14世纪初期伦敦城市政府规定除了属于圣安东尼教堂的猪以外，其他的猪必须围栏饲养，同时要确保它们始终安全地待在那里，在街道上游走的猪将会被宰杀，其主人也会被处以4便士的罚金，每天只有当专门的钟声响起后才可以把猪放出圈。即使围栏饲养牲畜，邻里间也会因动物粪便发出的臭味等问题而不睦。罗斯·德·赫兹就被邻居强制要求将她的猪舍从共用的墙壁处移走；金斯顿的大卫也被勒令搬走他建立在沃布溪岸边的猪舍。大部分牛羊饲养在伦敦城外有牧场的地方，亚当·德·爱和他的妻子丹尼斯在圣安德鲁·霍尔本教堂外有一个牛舍；当撰写《伦敦概览》的约翰·斯通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爱慈门外的一个拥有三、四十头牛的小牧场里为家人获取牛奶。

将重度污染的工业迁移出城也是治理工业污染的常用方法之一。伦敦市政在14世纪初期已开始着手将蹂革业迁移至城外的跛子门城区和法灵顿区，至14世纪末城内彻底禁止蹂革业生产，甚至在萨瑟克区和柏孟塞从事这一工业也要被处

以罚金。关于屠宰业废弃物的处理,14世纪初城市政府禁止屠户在街道宰杀牲畜,家禽商也不可在道路两旁给禽类除毛;1343年市政当局将弗利特河上的一个码头特许给屠户们用于清洗动物尸体。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如巴黎黑死病的调查报告就明确认定屠宰业中废物处理不当将对疫病的再次发生构成威胁,1371年伦敦政府规定宰杀牛需要到距离城区更远的城西骑士桥或城东斯特拉特福德。在考虑到屠宰业场址迁移至远离城市的地方后运费增加、肉类价格上涨的问题后,1393年伦敦市政在城内Queenhithe附近新建了一个屠宰场,前提条件是屠户同意将动物内脏切碎后用船只运送到泰晤士河中游处倾倒。对此问题,赫斯特·萨宾曾从国王、城市政府、屠户三方角度出发撰文论述。关于金属制造业产生的噪声污染问题的治理,伦敦市政当局采取禁止其夜间作业的办法。如制造铅管的工匠不准在晚上8点至第二天清晨5点间工作;角质容器制造者(horner)被禁止在夜晚工作;禁止马车车轮制造者在城内作业,原因是铁质车轮不仅会毁坏路面,还会给周围邻居带去噪音。

针对那些燃烧海煤造成空气污染的工业,城市政府于1306年发布禁止使用海煤的条令,并尽力确保木材、木炭燃料的充足供应。此时伦敦市场木材的来源地有米德尔塞斯克、萨里、埃塞克斯及白金汉郡、赫特福德郡、肯特郡的部分地区。1307年国王爱德华一世又颁布禁止各类工业窑炉以海煤为燃料的王室禁令。然而,这些规定是否得到良好的执行是一个疑问,据记录,1388年仍有9位商人从事着纽卡斯尔至伦敦的海煤运输和贸易。^[12]英国使用海煤最早可追溯至罗马不列颠时期,13世纪纽卡斯尔的海煤常被用作压舱石,1257年开始有明文记载伦敦输入海煤的贸易,随后海煤成为伦敦冶铁等工业所需的燃料之一,此类贸易得以继续发展,伦敦遂成为纽卡斯尔-泰恩茅斯-英格兰西南部各港口海煤运输线路上最为重要的城市。^[13]但可以肯定的是工业革命前海煤没有被广泛应用于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原因在于木材和木炭供应持续且良好,冶铁等工业无法解决因燃烧海煤而产生的去除杂质的技术问题,家庭生活中壁炉等处燃烧木材和木炭取暖效果好于海煤,等等。

人们日常生活和各类工业产生的污水废物均流入和倾倒入泰晤士河,13世纪初这条河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污染。1237年伦敦城市政府开始考虑通过铅管从泰伯恩(Tyburn)向城内引水,并于1245年动工安置管道。水源经查林十字街,沿文咸街、弗利特街,最后到达齐普赛街。位于齐普赛街的管道安装好后,城区监事会专门指定一人负责监督管道以保证净水供应通畅。15世纪由于泰伯恩水源短缺,市政决定重修供水线路,建立更为完整的供水系统。先在帕丁顿附近的Oxlese建立泉源,再向南安装水管至泰伯恩处,在那里与原来的供水线路相连通。1439至1455年间又陆续更换了所有的水管,翻修泉源。建立和维护城市供水系统的资金大部分源于市政征收的特别税,此外还有市民的捐赠、遗赠等。在伦敦从事对外贸易的亚眠、科尔比等地的欧陆商人曾为修建第一条水管出资100英镑;出于维护更换管道的需要,1312年市政开始对酿酒业、饮食业和渔业等商业用水收取费用,居民仍免费用水;1368年市政当局又将这条供水线的用

益权出租,承租者每年缴纳10马克的租金,合约期为十年,并负责维修裸露在地面之上的水管,而埋藏于地下的管道维护任务仍归市政当局。^[14]

城市环境卫生的监管办法除了颁布条令规章、对违者处以罚金、将污染严重的工业移至城外等,伦敦市政当局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增设专门负责环境卫生的政府官员。1274至1281年格雷戈里·德·瑞克斯雷担任伦敦市长期间,要求每个城区选出4人来监管和清理街道,同时城区的市政会议也有确保路面完好和道路干净的责任。1332年,每个城区设置一名监事(beadle),与其下属清道夫(scavenger)一同负责管理和清扫道路、收拾垃圾并将其移出城外。另外,市政当局还安排4个铺路工负责修筑整个城市的路面,并提供24匹马、12辆马车运送铺路所需的沙子、碎石和十个内城区的日常垃圾处理。1385年伦敦市政首次任命一名负责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的政府官员——河道监事(The serjeant of the Channel),他的职责包括疏通河道,监督视察城区执事、清道夫和耙路工的工作,确保城市街道的整洁干净等,15世纪又增添了对违规事件的记录和对违者处以罚金并及时汇总上报给市长和市政会的任务。据记载,1422年威廉·霍恩任监事一职时,他要清理泰晤士河两岸、勒顿豪市场、圣尼古拉斯的屠宰场。河道监事的薪水究竟有多少是一个未知,但有所获是一定的,1461年,允许监事身边有一个年薪为1英镑的家仆。身为河道监事的人也可兼任他职,1468-1472年的监事亨利·斯通和1472-1477年的监事约翰·霍尔都同时担任了城市财政事务官(chamber serjeant)。

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生活其中的居民的个体行为方式、思想意识息息相关。中世纪晚期民众的个人卫生意识提高,洗澡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伦敦的贵族和富人甚至使用从国外进口的铜制浴盆和昂贵的肥皂清洁身体,普通民众也仿效他们使用油脂与其他杂质混合而成的粗制肥皂。城内民居出现了私人厕所,建筑规章规定用石材修建的厕所须距邻居的土地至少2.5英寸远,若使用其他材料修建,要保持3.5英寸以上的距离。厕所还要定期及时清理,排泄物不许倾倒在街道上,而是在泰晤士河或城外处理掉。专业的掏粪工应运而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被视为卑贱低下的,只能在夜间无人时进行,但工资待遇却不是很低。1466年伦敦掏粪工约翰在清理厕所时可按每吨废物2先令2便士的标准征收劳务费,有人猜测他还可将这些有机肥料卖给城市近郊的农民而再赚一笔。^[15]此外,公共利益和城市归属感也随着建立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认同感一并在伦敦市民的头脑中诞生,人们开始将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私人济贫、医疗教育和城市环境改善等工作,富有者也将遗产的全部或部分捐献出来用于这类事业。

综上所述,笔者以城市环境史内在论为主要理论和方法依据,将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人为因素相结合,来尝试探讨中世纪晚期伦敦城市面临的各种环境污染及其成因和治理举措。13-15世纪的英国首都伦敦,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大量外来人流入导致人口过渡激增、工业和商贸迅速发展等,已经开始面对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给城市环境与卫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市政当局也

通过颁布禁令规章、设置机构官员等途径寻求整治这一问题的方法。尽管法令条例的执行情况、政府官员的监管力度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但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环境问题自古已有,绝不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才产生的,而且环境污染的治理和解决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参考文献:

- [1] 包茂宏.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J].2004 (4): 116.
- [2] Jason W.Moore,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M].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2: 301.
- [3] 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M].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4.
- [4] 里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村庄与城市 [M].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64.
- [5] 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 [M].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75.
- [6] D.M.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I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6、397.
- [7] P.克拉克, P.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 [M].薛国中,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93.
- [8] 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
- [9] Caroline M.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3-266.
- [10]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2.
- [11] Caroline M.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7.
- [12] William H.Te Brake, Air Pollution and Fuel Crises in Preindustrial London, 1250-1650 [J].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75: 341.
- [13] James A.Galloway, Derek Keene, Margaret Murphy, Fuelling the Cit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irewood and Fuel in London's Region, 1290-1400 [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96: 447、448.William H.Te Brake, Air Pollution and Fuel Crises in Preindustrial London, 1250-1650 [J].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75: 344.
- [14] [15] Caroline M.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5-257、259.

责任编辑:滕轩宇

Research on Lond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ts Governance During the 13th to 15th Century

Zhang Si

(History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London had been nagged by som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late medieval ages, which involving the living garbage pollution, air, noise, water and solid wast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ts reason was that the weak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mographic growth rapidly caused by a larg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was as the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centre of Britain. Therefore, the royal government and London municipality used various ways like enacting the statute and regulation, forcing the polluted industries removed out of the city, setting up the new government agency and officeholders, in order to manage the urban environment pollution.

Key words: the late medieval ages; Lond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governance